

坚持唯物辩证法 深化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

沈传亮

(中共中央党校,北京 100091)

摘要 近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成果丰硕,出现了四个新取向:宏观和微观相结合、跨学科方法和多元视角运用相结合、口述史料和文献资料相结合、地方改革开放史研究取得显著进展。但从提升研究的学术水平看,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还存在分析问题孤立僵化、看不到或看不清研究对象之间的复杂联系、解释问题不够全面准确、话语体系僵化保守、宣传性成果多研究性成果少、介绍性成果多深刻分析性成果少等诸多问题。上述问题的出现,与当代人研究当代史难、学界存在整体焦虑、心态浮躁以及盲目照搬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等诸多因素有关。其中一个难以忽视的重要原因是有的研究者没有能够运用科学的方法论来指导。因此,深化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既要敢于借鉴、合理运用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虚心传承中国优良的治史传统,但更应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展开。

关键词 唯物辩证法;中国改革开放史;普遍联系;永恒发展;对立统一

中图分类号 B0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987(2020)03-0011-08

DOI:10.16392/j.cnki.14-1057/c.2020.03.002

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对象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时间范围是从1978年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一般来说,它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发现的哲学原理,科学反映了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是研究分析问题必须遵循的科学方法论。坚持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遵循万物普遍联系、按自身规律永恒发展的基本特征,掌握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有利于进一步深化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

一、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1978年12月召开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共党史、新中国史实现伟大转折的标志,自此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有关改革开放史的研究也渐渐进入了研究者视野。1979年2月10日,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校主办的杂志《实事求是》,发表了黄汉江

撰写的《阶级斗争与工作重点转移——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笔记》,这是国内较早开展改革开放史研究的作品。在改革开放史研究已经进行40多年后,学界很有必要予以回顾和反思,以更好推进往后的研究。

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俨然是当今学界研究的显学。40多年来,学界出版论著数十万计,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祖国统一、国防军队、外交、党建等各领域,相比较而言涉及经济、政治领域的论著更多一些。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迄今已出现四次高潮,第一次是1988年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前后,全国很多部门、很多杂志都召开了座谈会,出版了一些论著。第二次是1998年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前后,中共中央专门召开纪念大会,江泽民出席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个阶段的代表性著作有沈宝祥著《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于光远著《1978:我所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朱佳木著《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文献出版社

收稿日期 2019-12-18

作者简介 沈传亮,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改革开放史,中共决策理论与实践。

1998年版)盖军、谢春涛主编《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著《中国改革开放20年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等等。第三次是在2008年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前后,中共中央专门召开纪念大会,胡锦涛出席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中央宣传部还组织了全国性理论研讨会。这个阶段论著的数量质量都有较大提升,代表性著作有:张树军著《中国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实录》(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08年版)程中原、夏杏珍著《转折与新路》(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等。第四次研究高潮出现于2018年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前后。仅2018年出版的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的论著就数以万计、蔚为大观,2019年也有大量论著问世。其中综合性论著方面代表性著作有: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组织出版《中国改革开放史全景录》(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共32卷,中央卷1卷2册、31个省市区各1卷,对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进行梳理,为改革开放成功画像。中国社科院组织出版“改革开放研究丛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集国内一批著名学者,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层面对改革开放进行了回顾和梳理。中国人民大学党史党建研究院出版的“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丛书”(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版),分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外交和执政党建设7个专题,全方位、多视角解读改革开放进程,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编的《改革开放实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版)介绍了北京、上海、天津等地案例,如“首都经济”的形成与实践、首钢承包制的建立与实施,特点鲜明、地方色彩浓郁,是了解地方改革开放史不可多得的好书。个人著作方面有:李培林主编《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1978—20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蔡昉著《四十不惑: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经验分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俞可平主编《中国的治理变迁:1978—201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等,也在学界产生了较好反响。口述史料、自述类著作也出版了一些佳作^①。

近些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出现了四个新

取向。一是注意宏观和微观相结合,既有宏大叙事也有个案研究,注意宏大叙事与历史细节的结合。即使研究个案也注意到个案和整体间的联系,即使宏大叙事也开始关注个案的介绍和分析,不再像以往“天上飞的”和“地上走的”各走各的,没有交集。比如谢春涛主编的《改革开放为什么成功?》(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既注意从宏观上把握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沧桑巨变,又用大量故事和细微个案来细细铺陈,是把改革开放史通俗化写作且有较高学术含量的一部精品。这为解除学界关于宏大叙事和个案研究间撕裂的隐忧做出了贡献。二是跨学科方法和多元视角运用的结合。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涉及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历史发展,单一学科方法很难把如此丰富的实践解释透彻,单一视角很容易遮蔽蕴含丰富变化的历史进程。近些年来,研究者大量借鉴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方法运用于改革开放史研究,并取得一定进展。研究者也不再拘泥于一个观察角度,而是多角度来研究观察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事件。比如观察中国40多年来的政治变迁,就不再拘泥于上层政治政策的变化,有的聚焦政治体制改革予以考察,有的则从治理的视角进行研究,还有的从党政关系的角度分析,使得中国政治变化更加丰富地展现在阅读者面前,使得政治语言和学术语言的贴合度更加紧密。三是较多运用口述史料和使用文献资料相结合。中国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属于当代人写当代史,既要注重文献史料的爬梳,也要注意利用好时代性条件进行口述史料的搜集整理。比如萧冬连所著《探路之役:1978—199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是这一新趋向的代表作。该书既注重对经济体制改革参与人、亲历者采访实录的运用,也大量使用了中共披露的诸多重要文献,是不可多得的解读经济改革的一本好书。四是地方改革开放史研究取得显著进展,为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水平的整体性提升注入新的活力。改革开放史研究过去主要停留于解释如何实施和推动改革开放,侧重梳理改革开放的高层政策变化史,但是关于高层政策如何落地,地方如何按照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展改革开放的书却不多。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全国地方党史

^①比如 欧阳淞、高永中主编的《改革开放口述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曲青山、吴德刚主编的《改革开放四十年口述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高尚全的《改革只有进行时:对3个三中全会改革决定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鲁利玲的《与改革同行:体改战线亲历者回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王小鲁的《改革之路——我们的四十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等。

研究部门出版了各地改革开放史的著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论著出版,有的省份还组织出版了省辖各市的改革开放史。地方改革开放史研究成果的海量涌现,为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走向深入奠定了基础。

总的看,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高潮迭起,新取向渐成趋势,成果可谓丰硕,成绩必须肯定。但从提升研究的学术水平看,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存在分析问题孤立僵化、看不到或看不清研究对象之间的复杂联系,解释问题不够全面准确,话语体系僵化保守,宣传性成果多研究性成果少,介绍性成果多深刻分析性成果少等诸多问题。具体来说,有的研究成果只论及中央决策忽视了地方领导的智慧与贡献,有的研究成果只看了部分中央文件而没有用地方档案予以支撑,有的研究成果表面上运用多学科方法但实际上并未做到,有的研究成果话语体系陈旧令人难以阅读,有的研究成果宣誓色彩浓厚学术气息稀薄,等等。

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中出现的上述问题,除了当代人研究当代史难的原因外,还与学界存在整体焦虑、心态浮躁以及盲目照搬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等诸多因素有关。其中一个难以忽视的重要原因是有的研究者没有能够运用科学的方法论来指导,归根到底与不能很好运用唯物辩证法有关。今后,继续深化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既要敢于借鉴、合理运用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虚心传承中国优良的治史传统,但更应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展开。

二、运用唯物辩证法深化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的路径分析

唯物辩证法内容丰富,包括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三个方面。唯物论的主要论点有世界是物质的、物质第一性、运动是有规律的、运动是物质的运动。辩证法的主要论点有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矛盾的观点、辩证否定的观点。认识论的主要论点有认识从实践中来、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反作用于实践、在实践中探索和发现真理。本文主要从辩证法角度,结合唯物论、认识论,尝试分析如何深化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

(一)改革开放史研究应贯穿普遍联系的观点

世界万事万物都存在联系,联系具有普遍性、客观性、多样性、条件性。列宁认为,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1]29-130}。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应该用联系的观点看待问题、分析问题。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过程中,有的研究者受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影响,肆意割裂历史;有的研究者偏好研究细小个案,有意无意忽略整体与部分间的辩证关系,为研究个案而研究个案;有的研究者即使尝试从整体上把握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史,但由于视野格局不宽、总体把握能力不强,也没有发掘出整体性研究的应有价值。今后若要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当尽量避免以上问题。研究改革开放史既要关照前后、上下、左右联系,也要注意国内国际互动,呈现事物间联系的客观性、多样性和条件性^①。

运用联系的观点观察和深化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二十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2]这一重要论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是运用联系观点分析问题的典范。

为何要突出强调改革开放前后时期的历史关系呢?这主要是针对近年来理论界、学术界,有的人割裂新中国历史,用改革开放后取得的巨大成就“印证”改革开放前存在诸多问题,借此否定改革开放前的成绩;也有的人觉得改革开放虽取得巨大成就,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贫富分化现象突出、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腐败问题突出,进而认为上述问题的解

①牛军著《冷战时代的战略决策》(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版)在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外交领域重大战略时,注意各种因素的复杂互动,尤其是国内国际互动,宏大叙事和历史细节兼备,堪称一部经典著作。

决都需要运用改革开放前的治理思路,回到计划经济轨道上去等,用改革开放前否定改革开放后。这些看法的产生相当程度上可归因于,没有看到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不能从整体上把握历史。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都属于党领导人民接力推进伟大社会革命进程中的阶段,体现了继承和超越、“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是源和流的关系^[3]。今天取得的辉煌成就,离不开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进行的基础性建设;历史上出现的问题甚或犯下的错误,终将成为今后改革开放前行的警示。比如,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推动粮食产量节节攀升。有的人就此简单得出结论,说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实行了包产到户。这一看法不全面也不准确,忽视了包括化肥的使用、农业科技的提升、良种的培育等很多因素的综合作用。谈及化肥的使用,就要看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实施的“四三方案”,中国引进了四套大型化纤设备,在改革开放初期发挥了巨大作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就认为,改革前中国在教育、保健、土地改革和社会变化方面的成就,对改革后的成绩做出了巨大的积极贡献,使中国不仅保持了高预期寿命和其它相关成就,还为基于市场改革的经济扩展提供了坚定支持^[4]。当然,对于以往犯的错误,中共不仅勇于承认且认真分析了深层次原因,表示尽量避免再犯同样错误。

研究改革开放史既要注意到纵向的历史联系,也要看到改革开放重大决策过程中的上下联系,即央地互动。改革开放40多年来,有很多重大决策带有鲜明的上下结合式特点。比如中共中央决定建立经济特区,经历了地方领导大力呼吁、中央高度重视、派人前往调研、最后中央拍板决定的过程。简言之就是,1978年4月,中共中央派习仲勋到广东工作,担任省委第二书记,把守中国南大门。到广东后,习仲勋广泛调研,积极谋划推动广东发展。广东存在的严重的“逃港潮”现象,引起他的高度重视。调研后他发现,与广东隔河相望的香港,1978年人均收入高达13000港币,而广东农民一年人均收入才130多元。广东不少农民想尽一切办法要到对面的香港讨生活。要从根本上解决“逃港潮”的问题,就必须推动广东尽快发展起来,让广东人民过上好日子。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建议中央给广东特殊优

惠的政策,让广东发挥毗邻港澳的地理位置优势,办一些出口加工区,尽快把广东发展起来。福建省的领导同志也有类似建议。会上,中央领导当即决定派人前往广东、福建两地调研,为进一步决策提供地方实际支持。会后,党中央派分管有关工作的谷牧到广东、福建两地展开调研。在调研基础上形成的中央50号文件,决定给予广东、福建特殊优惠政策。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同年国务院批复福建厦门为特区,也即深圳、珠海、汕头、厦门作为经济特区是在1980年被批准的。从这一决策过程的简述能看出,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尤其是设立经济特区的决策,经历了一个下面有所呼、上面有所应的良性互动过程。这种上下结合式决策,体现在改革开放史上的很多重大事件中。比如,1984年3月22日至24日,55位来自福建全省各地的厂长、经理到福州参加“福建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会议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交流搞好企业的先进经验。企业负责人在会上纷纷倾述企业无权之苦,生产计划、原材料、工资奖金、干部人事统统受限于计划经济积弊。时任福建省经委副主任和福建省企业管理协会负责人的黄文麟根据厂长、经理们的发言,主笔起草了《请给我们放权》的呼吁信。这封“松绑放权”呼吁信不但得到福建省委、省政府的重视,还在全国激起舆论风潮。福建连续出台9个下放权力的政策性文件。同年5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给企业扩大自主权。这些案例表明,从上下联系的视角分析问题,会给研究改革开放史带来更大空间,也使研究更有韵味。

当然,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还要注意横向联系,尤其是地区之间、事件之间的左右联系。比如,农村改革过程中实行包产到户,不仅要看到中央政策的演进对于农村改革的推进,还要看到各地之间的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安徽、四川、甘肃、内蒙等地的先行先试,影响和带动了全国各地。这种横向联系,彼此之间的学习借鉴,极大推动了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也影响到了城市改革的推进。类似这种联系,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承包制的运用、各种园区的建立等等都有鲜明体现。

(二)改革开放史研究应贯穿永恒发展的观点

唯物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发展具有普遍性,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事物发展的

趋势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事物的发展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量变和质变是事物发展过程中两种不同的状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事业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无论是经济领域的深刻变革还是政治、社会、文化领域的体制改革,都曾遭遇意外,甚至有时出现后退。有的改革开放史研究成果给阅读者的感觉是中国改革开放顺顺利利,一路凯歌高奏,一个胜利接一个胜利,恰恰没有反映真实的改革开放历程。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应该遵循唯物辩证法关于发展的观点,向读者力所能及地展示纷繁复杂的历史真相。

坚持发展的观点,可避免对改革开放史上的人和事的判断或评价过于片面、简单、独断。比如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有的研究者把某些人物标签化,把一些人看成是计划经济的坚定支持者,把另外一些人看成是市场经济的坚定支持者,认为这些人界限分明,没啥变化。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有的人可能起初坚持计划经济,随着实践的推进、改革开放的深入,也会接受实行市场经济。比如,邓力群曾组织编写《访日归来的思索》,对斯大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价值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规律互相排斥”等过去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主张提出质疑,主张学习日本的做法,企业、部门和国家的计划都要“以价值规律为前提,或者充分适应价值规律的要求”。从这时开始,直到1982年中期后其观点有所变化,邓力群都是主张中国实行商品经济的重要人物^{[5]13}。这种客观分析显然不同于一般的说法。历史是复杂的,人也是复杂的。历史充满偶然性,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也非一成不变,而更多的可能是常常发生变化,有时变化甚至很大。20世纪80年代初,主张搞计划经济的人,随着改革开放取得卓有成效的成果,也可能成为市场经济的坚定支持者。这在有些经济学者身上甚至在一些党的领导人身上,变化特别鲜明。因此,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史,切忌用僵化、静止的眼光看待人和事。

实践表明,改革开放历程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就中国走上市场经济之路而言,匈牙利经济学家彼得·米哈利一度认为,中国走出“文革”非常轻松,好像是一场愉快的郊游,但东欧国家摆脱这样一种理性的计划体制就是一场艰苦的长征。这一判断不尽准确,显然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存在误读。他之所以得出这一有失公允的判断,一方面是因为对

中国改革开放走向市场经济之路的研究不够深入,另一方面从方法论上看他不可能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研究中国问题。北京大学姚洋教授经过深入扎实的研究后认为,“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中央计划经济转变为混合所有制的市场经济。这个过程好比一条泥泞的道路,坑洼不平,转弯频频,甚至出现过后退,但每次改革都能得以继续。”这一判断比较符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进程,经济改革确实经历了多次挫折。只有既看到事物发展的曲折性又看到事物发展的前进性,才能对中国改革开放史有比较全面的准确的把握,才能避免陷入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极化思维中。这实际和人的认识具有不可弥补的局限性有关,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可能一步到位,存在一个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过程。正因如此,人才更加需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观察远处的事物,需要借助放大镜,观察细微的事物,需要借助显微镜,和上述表明的都是一个道理。

任何事物实现突破性发展,多存在一个量变的积累过程。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历程,无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性大转折,还是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国进入新时代,都体现了质量互变规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习近平指出,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这一重大决策的作出经历了两年多的准备。这段时间内,中共深刻反思“文化大革命”、发展的落后、国际形势,从初步平反冤假错案、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到召开国务院务虚会等系列会议,从恢复高考到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从封闭保守到派出大批领导人出访考察外部世界,为走向历史转折、赶上时代作了准备。正如邓小平所说,粉碎“四人帮”以后三年的前两年,做了很多工作,没有那两年的准备,三中全会明确地确立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是不可能的。所以,前两年是为三中全会做了准备^{[6]242}。从“文革”结束到实现转折的过程是一个量变积累引发质变的过程。正如1859年1月马克思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时提出的著名的“两个决不会”,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

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4]足见,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全新视野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论断。我国进入新时代,不是凭空臆想,而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长期努力奋斗的宝贵结果,是在发展到一定水平基础上得出的重要结论,反映了中国社会变化发展的客观实际。

需要指出,历史上的有些突破性变化不一定经过长时段酝酿,有时有可能短期内出现。新中国成立前的解放战争中就发生了突破性变化,新中国成立后向社会主义过渡也属于突破性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也有不少次突破性变化,比如20世纪80年代后期启动的价格改革闯关没有成功,而在90年代大规模市场化推进过程中顺利实现。再比如党的十八大以来发生的历史性变革,短短五年就出现了,这反映了非常之势取得非常之功。研究改革开放史既要注意到历史的积累,量变的因素,也要看到事物有突变的可能性,同时既要看到必然性也要重视偶然性,因为有些偶然性因素甚至能决定历史的走向。

(三)改革开放史研究应贯穿对立统一的观点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即对立统一,矛盾双方的斗争性和同一性,是矛盾的基本属性。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矛盾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运用矛盾的观点分析问题,必须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矛盾是事物联系的实质内容和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从根本上说就是不断认识矛盾、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一部改革开放史,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认识矛盾、解决矛盾的历史。

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中共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5]。中共实施改革开放就是为了更好解决中国走向复兴路上的问题。邓小平在1978年12月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6]^[50]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面临的矛

盾更加复杂,既有过去长期积累而成的矛盾,也有在解决旧矛盾过程中新产生的矛盾,大量的还是随着形势环境变化新出现的矛盾。这些矛盾许多是这个发展阶段必然出现的,是躲不开也绕不过去的。研究改革开放史,必然要研究中共十八大以来这段正在进行的光辉岁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强调指出:“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可见,从矛盾和问题切入展开研究,更能贴近中共领导下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这段最新历史。

对待矛盾的正确态度,应该是直面矛盾,并运用矛盾相辅相成的特性,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推动事物发展。深化研究改革开放史,必须活学活用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矛盾的观点。中国1978年以来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就是因为发扬敢闯敢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直面存在的问题,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一路向前。之所以取得巨大发展,还在于中共基于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较好处理了矛盾的主次方面,没有因小失大,没有顾此失彼。比如,20世纪80年代初,鉴于沿海地区出现较多走私贩私等不良现象,经济特区发展一度遭受质疑,有的特区甚至被比喻为旧上海的“租界”。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提出要去走一走、看一看。1984年初,他视察深圳、珠海等地,看到经济特区发展一派兴旺发达、你追我赶的热烈场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更是震撼人心。邓小平通过调查研究看到了事物发展的主流和主要方面,因此提出,对外开放的政策不是收而是放,促使中共中央下决心继续扩大对外开放。而对经济特区的发展提出诘难的人,显然没有看到矛盾的主要方面,看到的是次要方面、看到的是支流。

当然,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学会既讲两点论也抓重点论,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比如,邓小平南方谈话充满了矛盾分析法,富有辩证法意味,是改革开放史上乃至新中国历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邓小平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对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

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9]375-377}。这些重要论述,鲜明体现了邓小平有着极强的辩证思维能力。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鼓舞下,中国改革开放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比如,中共十八大以来,共产党提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在推进这“四个全面”过程中,中央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全面部署,又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既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顶层设计,又强调突出抓好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既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系统部署,又强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总目标和总抓手,既对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系列要求,又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突破口,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四风”问题,着力解决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问题。在任何工作中,只有既讲两点论,又讲重点论,才能顺利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如果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肯定做不好工作。当然,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必须要看到矛盾的变化性。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就是基于对国情变化的科学判断。

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还要坚持创新观点,树立创新意识。创新是一种辩证的否定,是事物自身的否定,是任何事物继续发展必然经历的过程。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也自然会对研究者提出秉持创新意识、增强创新能力的要求。当下,迫切需要研究者不断创新研究话语、创新研究视角、挖掘新史料。就创新研究话语而言,难度虽大,但必须迎难而上。目前,少数研究者所用话语革命色彩浓厚跟不上时代,极少数人的表述充满奉承阿谀缺乏独立思考。陈旧的话语,既反映不了时代的变迁,更是跟不上实践的变化。进入21世纪20年代,改革开放史研究者必须鼓起创新话语的勇气,积极躬身实践。改革开放史研究者创新话语表达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追求提高在学术界的生存能力。再不创新话语,封闭起来自成一体,不仅会被学界唾弃,也迟早会被读者抛弃。究竟如何创新研究话语,兹事体大,需要另撰文详述。不过,创新话语首要推动研究话语贴合时代、贴合实践。目前一定程度上,不少改革开放史研究成果还停留在就事论事、一事一议的层次,缺少精品力作,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研究者的话语表述陈旧、研究方法单一、大量丰富史料没有纳入研究者视野,尤其是阐释

性、宣传性语言痕迹过重,学理性分析、深度思考不够。深化研究改革开放史,要求研究者坚持运用创新的眼光、创新的方法、创新的思路,看待分析这一段新鲜的历史。比如,对研究者而言,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史如何分析总结,对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如何用学术的语言而非政治性语言予以研究梳理,就是一个重要任务。当然,也有些研究者尝试从不同视角、运用不同方法来观察和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但离深入分析还相距甚远。

三、余论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方法论。前述比较多分析了如何运用唯物辩证法中的辩证法加强研究改革开放史。同时,还需要活学活用唯物论和认识论,将唯物辩证法内容融会贯通于研究,以更好推动改革开放史研究。研究者还应当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努力提高研究改革开放史的治学本领。

当然,研究者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同时,也很有必要借鉴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与方法、西方史学有关理论与方法。中国拥有研究历史的悠久传统,形成了很多好的治史经验和方法,求真求实的研究态度更值得传承发扬。西方史学研究也是源远流长,有大量的理论和方法累积。我们应该坚持守正出新、开放包容,秉持包容性思维。治史理论或方法无论中西,研究者都要有足够的雅量,争取为我所用。方法论的运用不应是排他性的,而是开放性的、包容性的。研究者只有兼采众长,才能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跟上时代,乃至引领时代。

应该看到,当代中国经由改革开放实力愈益增强,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世界越来越关注中国的发展。世界上研究中国、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学者越来越多。在这种大背景下,更需要中国研究者沉下心来,为世界贡献更多的高质量研究成果,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突出强调深化改革开放史应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是因为很多人自觉不自觉地忘记和忽视了这一科学方法论,而对照抄照搬西方的史学理论与方法比较热心,存在盲目求新求洋的弊病。当然,还和一些人口口声声说用了这一方法,而实际上没有运用,即使用了也没用好有关。只有坚持唯物辩证法这一科学方法论来研究和分析问题,我们才

能树立研究自信,占领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史的高地,避免改革开放史研究领域成为西方理论“跑马场”或“实验室”的悲哀,为世界贡献中国改革方案。

[责任编辑 马 艳]

参考文献:

- [1]列宁.国家与革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2]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J].求是,2019(7).

- [3]沈传亮,肖鹏.科学把握新中国70年的历史演进[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5).
[4]阿马蒂亚·森,让·德雷兹.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机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5]吴敬琏.中国经济改革进程[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8.
[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8]习近平.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J].求是,2019(1).
[9]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Adhering to Materialist Dialectics to Deepen the Study of History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Shen Chuanliang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made fruitful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with four new orientations emerging: the combination of macro and micro, the combin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methods and multiple perspectives, the combination of oral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documentary materials and remarkable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local reform and opening up. Howe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proving the academic level of research,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which are the analysis of the problem is isolated and rigid, the complex relation between the research objects cannot be seen or seen clearly, the explanation of the problem is not comprehensive and accurate, the discourse system is rigid and conservative, the propaganda results are more and research results are less, the introductory results are more profound and analytical results are less. The emergence of the above problems is related to a number of factors. One of the important reasons is that some researchers fail to apply scientific methodology to guide. Therefore, to deepe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we should not only have the courage to learn and apply western historical theories and methods rationally, but also carry forward the fine tradition of Chinese history with an open mind. And we should follow the guidance of marxist materialist dialectics.

Key words materialistic dialectic; history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universal connection; eternal development; the unity of opposites